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文化强国

戴兆国

在中国优秀道德文化传统中,各种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论相映成辉,从各个层面均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为此,我们分别从社会、国家与民族、个人3个维度尝试对优秀道德文化传统中的部分内容加以辨析,以提炼对当下文化强国建设富有建设性的道德资源。

以公天下意识为核心的美好道德理想有助于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的道义水准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追求公天下的理想为显著特征。分析来看,公天下的道德理想包含4个方面的道德理念,即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

天下为公的道德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循从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有观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正是在人与自然道德理念的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

天下观念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基,其他社会性的道德理念皆由此而生发。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从一种普泛道德的立场,提示人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姿态。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精神,就是要利济世、博爱大众。在仁爱精神的引领下,尊老爱幼、体恤孤独、济困扶危、风雨同舟、大爱如山等具体的道德规范,为公天下的道德理想提供了人们如何行动的指南。尚中贵和的道德精神体现的是高度的和合思想。提倡中和之道,主张以和为贵,为的是人与人之间相生相助、和乐如一。由此出发,公天下的社会道德不仅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美好期待,更是对大同理想的快乐期盼和追求。这些道德理念和规范的实施带有中国道德文化的特有气质,那就是将人类自身的道德追求放置于一种快乐、和谐的美好境界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承不竭的道德能

量。相比于西方道德文化追求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念,公天下的道德主张具有非常高的道义水准,这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高起点的道义支撑。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价值观念体系涵盖了社会、国家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其中,在社会层面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要求的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也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基本规范。在公天下的道德理念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其追求的价值基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必须是富足的、人人平等的、社会高度文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也都达到了和谐的状态。因此,我们说,如果合理地继承以公天下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对于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裨益良多,对于文化强国建设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文化强国的民族意志

中华民族的先民生活的环境相对较为复杂,从早期的大禹治水,到后来的战乱频繁、外族入侵不断,这一切使得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儒家在倡导王道仁政,道家反对统治者过分干预百姓生活,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等,都有着内在的忧患。他们忧患于天下不得治,忧患于百姓生灵涂炭,忧患于苛虐暴政,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些饱含着忧患意识的居安思危的精神,体现着人们忧国忧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是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为深沉的民族道德心理。

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建构起一整套家国道德观念,主要包括民贵君轻、尊师重教、任人唯贤、清廉公正、协和万邦等。民贵君轻的本质是一种民本精神。在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的时代,普通人特别是被统治阶级很难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获得话语权。但是国家是否能够得到长治久安恰恰也需要基础的稳固。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观察历史

的成败得失、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过程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民为万世之本”的治国理念。《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古人的国家治理观念中,只有各民族平等相处,天下百姓对于国家政治清明抱有极大的希望,万邦和谐、共同发展的局面才会到来。

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局势,如何找准当前中国未来发展的定位,需要强大的民族意志。以居安思危为核心的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强烈意志,以上所提炼的民族国家道德观念无疑都是这些意志的具体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在国家层面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其所依据的道德基础很多都可以从传统道德文化中加以汲取。如平等的价值观念就根源于民贵君轻的道德观念,公正、法治也是传统国家治理过程中廉政文化的具体要求。中华民族古老传统形成的民族意志,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激发民族意志,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意志坚强的民族,才能够在世界民族的竞争潮流中立足于不败之地。

以见利思义为核心的行为道德标准有助于显现文化强国的主体意识

在天下情怀的召唤下,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在传统道德文化中异常凸显。在对道德行为的要求中,以义制利虽然是一种较为难于达到的行为标准,但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却是约束行为的主要规范。在义利关系规定的范围内,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威武不屈、杀身成仁等道德规范,都在义以为上的道德观念规范下,成为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现实中的个人总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着,孤立的、个体的、原子式的人是不存在的。在我与他的关系中,利益关系是我们行为方式的依据。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任何社会、

任何人都要遇到的问题。儒家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观点。“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对义利的不同取舍代表了道德主体的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将义作为行为的主导标准,是对道德自我主体性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自觉意识。

义作为约束个体行为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现实的各种活动中,是以各种具体道德要求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包括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威武不屈、杀身成仁等偏重于个体性的道德要求。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都强调任何个体必须在诚信的基础上去从事各种活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是普遍不受欢迎的人。除了诚信的底线要求,每个人还要能够自强不息,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勇于挑战自我,实现人生的超越。广泛流传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传说,其实就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在国家意识的激发下,一代代志士仁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拼搏进取,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取得灿烂辉煌成就的精神基础。敬业乐群、勤俭节约等具体的职业和生活美德,也是从个体层面提出的要求。

在义以为上的道德精神感召下,可以阻止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在人们思想中扎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这种重义传统,充分调动了个体对于自我道德人格的培养和修炼。如果所有道德主体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再加上社会法制生活的不断健全,主体行为就一定规范得体,主体的道德行为也就真正获得一种自由。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对个体道德的价值引导,诚信作为其中的价值原则,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定是爱国的人,也一定是敬业友善的人。当全社会形成一种诚信有道、义以为上的道德风尚,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道德主体性就会卓然挺立。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哲学系主任)

潮音阁

禁用「洋地名」是文化回归第一步

张枫逸

在北京看到“天鹅堡”、在苏州看到“普罗旺斯”,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有媒体随机选取全国12座城市240个小区,发现1/5的小区在命名的时候,含有外国的信息。明明是中国的建筑,与异域风情毫不相干,却硬要冠上加州水岸、普罗旺斯等洋名,显得不伦不类,多少有点讽刺。

近日,《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10月15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宾馆(酒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建筑物及居民住宅区名称,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名字、外国人名和外国地名做地名。

对于洋地名的热衷,不仅是简单的拉大旗作虎皮,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体现。在一些管理者看来,用有国际范儿的名字命名,可以提升城市档次,从心理上缩短与国际大都市之间的距离。而对于一些开发商而言,唯洋地名马首是瞻的另一面,是对居住文化的迷失。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有太多元素可以汲取,但一彰显浪漫,就要用到法国的地名;一突出时尚,美国的地名就成了不二选择。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被冠上了“洋名”的小区,每平方米单价几乎都在同城市房价的中上等水平以上。仿佛只要沾上一点洋气,身价立马就上去了。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刘东卫指出:“洋名小区泛滥是当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一定程度反映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隐藏在背后的国家文化本体性发生的转变。”由于西方文化在全球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导致一些人丢了对自己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认同,进而丧失民族自信。立法禁止洋地名,河南并非首例,此前南京、宁夏等地都曾出台过类似的规定。此举给洋地名泛滥套上了紧箍咒,理性纠偏的意义毋庸置疑。

地名并非一个枯燥的名称,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比如,一提到杭州的雷峰塔、断桥,就让人想到了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一说到西安的粉巷、竹笆市、菜板街,就让人有一种穿越回唐朝的感觉。遗憾的是,这样内涵深厚的地名被淹没在众多毫无品位的名称中。

洋地名只是地名文化贫瘠的表现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现象同样值得反思。一是地名雷同、缺乏特色。解放路、人民路、花园路,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很多城市都能找到。千篇一律的地名和千城一面的城市,都让人感觉索然无味。二是

用数字命名地名。河南信阳羊山新区道路名是在2006年12月公布批准实施的,但对于新八大道、新二十四大街这样的数字地名,许多当地市民至今还一头雾水,知道路,却搞不清楚路名。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数字地名或许便于规划,但其过于强调功能性,丧失了地名应有的文化内涵,也让公众难以接受。

正如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牛宁所言:“如果道路命名者能少一些媚俗、功利,让城市路名更具文化传承功能,更加朗朗上口,那么路名在传承城市历史发展的作用上将更加明显。”禁用“洋地名”只是文化回归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让有关部门和开发商对地名文化形成敬畏,通过邀请专家参与、面向公众征集等形式,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挖掘因子,让一个个苍白的地名鲜活起来,真正成为反映社会历史的“活化石”。

使命·沃土·现代化

韩万斋

一、由“玩”文艺及“实现自我价值”谈起

“玩”文艺及“实现自我价值”是前些年颇为时髦的两个口号。所不同者,前一口号只限于文人圈子里;后一口号则应用广泛得多。所相同者,都是以“本我”为核心——许多热衷于“自我价值”这个词汇的、高举弗洛伊德大旗的人,实际上连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3个不同概念都没搞清楚,便误将“本我”当“自我”,使“自我价值”的实现变成了一种不仅不对社会负责、不对国家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甚至对自己的家庭、爱人以及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的动物性的“本我”的实现。

文学艺术的功能究竟有哪些?这些功能中究竟有无主次之分?文艺审美究竟不存在“导向”问题……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提起和澄清的。

以文学艺术娱乐人,那是“文娱”;以文学艺术赚钱,那是“文商”;以文学艺术教育人,那是“文教”;以文学艺术进行宣传、鼓动,那是“文宣”;以文学艺术感人、潜移默化人,那是“文化”。虽然各个行业的人从其行业的立场出发而各执一端,强调某一功能的重要性,作为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无疑当以“文化”为主旨,以真实、生动的文学艺术形象和高尚的目的去感人、潜移默化人。欲达此目的,就必须有正确的审美趣味导向。

高级饭店里的厨师,从来是把自己所做的饭菜当做艺术品而倾注满腔心血,严肃认真对待的。文学艺术亦如此,比如音乐:办喜事,要奏喜庆音乐;死了人,要放哀乐;高兴了,要唱几句欢快的歌;痛苦了,要唱几句悲哀的歌;相爱了,要唱一大串儿的“爱恋”;失恋了,要唱一大串儿的“愁丝”……喜怒哀乐,人情所不能免也。乐者,既为“心之声”,它也就和吃饭、穿衣一样,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谓通俗音乐,那当然是人类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东西。伟大的音乐家们哪个能禁止得了车间、地头、街巷、家庭中的普通人的不符合“作曲法”

或不符合“科学发声法”的自编、自演、自唱的歌?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大业的基础首先必须是良好的国民素质。若没有健康的、高尚的美育,就不可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品德高尚的大众。单纯的德育如一无轴独轮,难以稳进,更难以完成其使命。

健康、高尚的审美导向的形成,是以文学家、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及评论为基础的,“文如其人”“乐为心声”“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这些都说明了“正人先正己”以及文学家、艺术家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列宁1919年7月31日写给高尔基的信中指出:“要观察,就应该到下面去观察——下面可以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文学艺术要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并肩负起以健康高尚的情操感化人、潜移默化人的神圣使命,就必须要求文学家、艺术家加强道德修养、割除自身的腐败、走出精神贵族的“沙龙”。

二、安泰的启示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的故事,几乎任何一个初涉文学艺术领域的人都熟知:他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他的母亲——大地。只要他的双脚离开大地,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后来,人们把母亲——大地进一步引申,成了祖国、人民的同义语,启示着一切人,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不脱离人民。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精辟指出:“现实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同志还热情地呼吁:“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到唯一的最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实践证明:真正优秀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深深扎根于人民、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上的。而那些远离人民、远离民族土壤的“寂寞”“无奈”“苦闷”“惆怅”“孤独”“冷漠”的醉生梦死或歇斯底里,只能像流行感冒一样,给一些受众带来负能量。

我们的华夏之邦是一片沃土。古往今来,涌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有孔夫子、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伟人;有屈原、杜甫、周恩来那样的忧国爱民之士;也有文天祥、鲁迅、彭德怀那样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铮铮铁汉。更有无数不知姓名、默默无闻如自贡历代盐工那样的奉献者;有那一腔热血,无私无畏,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为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的无数开路先锋和浩荡大军……难以计数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珠辉玉映、流光溢彩;世界上最早的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世界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世界上壁画的最大集中地“敦煌莫高窟”、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有固定音高的敲击乐器编钟,还有关汉卿、汤显祖、司马迁、吴承恩、曹雪芹、顾恺之等名震环宇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极其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宝藏。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之泉永不枯竭。只有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之树劲挺挺拔。

三、开放、借鉴与虚无主义

扎根于土壤中的大树,需要大地的负载与巩固,需要土壤中的养料与水分,同时也离不开阳光、雨露、空气……扎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文学艺术,需要来自民族民间文艺与优秀遗产的滋养,同时也离不开当代的、国外的优秀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营养。没有开放与借鉴,文学艺术之树就会因营养单调、贫乏而枯萎。前些年,黄土地上刮起了一阵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之风,一些人把文学艺术之树从民族的土壤中拔了出来,抛上那出了轨的外国列车。当人们

着手纠正这种状况时,还遭到了他们的批驳。文学艺术只有质量、品位的高低之分,而无风格、流派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所谓文学艺术的现代化应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的基础之上,不断吸收当代的、外国的新经验、新技法、新观念,同时也不能丢弃自己本民族的东西。

既然要学习与借鉴外国的新经验、新技法、新观念,那就首先应该强调个“新”字。于是乎,“代沟”一词前几年就颇为时髦了一阵子。盖言“本代人”者,那就应当是掌握着当代最新经验、最新技法、最新观念之人了吧?然而,很令人失望,在他们那里大为“流行”的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统统都是在国外早已过时的东西。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的东西,如:里夫金的“熵”定律,马斯洛的心理学……仍有待时间检验。我们再抛掉一切偏见,真正平心静气地,深入、全面地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它们的基本原理与我们过去的成就、偏差、失误进行对照、总结,同时将它们与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里夫金、马斯洛、波普尔、萨特的理论对比一下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样放射着思想的光芒!事实上在台湾、马列恩、恩格斯的《资本论》也是被评为“1990年十佳畅销书”之冠;在2004年由德国电视二台和德国《图片报》联合主办的“最伟大的德国人”评选活动中,马克思名列第三,名次排在了巴赫、爱因斯坦、歌德之前。国内外的许多出版物中,毫无例外地把毛泽东列为“对世界历史产生伟大影响的伟人”……

郁达夫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坚定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积极地吸收世界上一切真正优秀的、先进的养料,使中华民族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跻身于世界先进的民族之林! 路冀于斯,奋争于斯!

观点摘编

语言兼具战略性和文化性

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都具有双重特性:战略性和文化性,二者缺一不可。汉语作为载体,在传承源远流长并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对中国周边文明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可以说,“文化性”是汉语一贯具有的特性。即使在中国国力衰弱的时期,“文化中国”和“文明中华”的力量,依然确保了汉语在海外维持起码的、可持续的学习人口。换言之,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吸引力,是中文在海外得以几世纪维持下来的香火。但从另一方面讲,欲探究近年来的全球中文热,就要跳出“文明”和“文化”的固定思维。

——孙晶:《海外中文热与“语言外交”》,原载于《人民论坛》2013年第28期

重视音乐表演临场状态的“心斋”与“坐忘”

作为实践的身体美学的一个分支的音乐表演艺术,身体问题的显现,是对西方主客对立二元论哲学遮蔽身体、忽视身体的反拨。也是以身体为乐器,以身体的运动系统操作乐器,身心一体的音乐表演艺术的身体意识、身体观念的昭示。这必然涉及音乐表演艺术对身体整体观念的认识与实践。在诸如高扬身心一体的身体观,重视演奏、演唱的临场状态,突出音乐表演艺术的实践性、操作性、不断完善性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引导我们积极吸纳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美学资源,如庄子谈艺寓言中的“心斋”“坐忘”,得心应手、心手合一,技近乎道等思想精髓,从而实现音乐表演中的人琴合一、心物相融,超越演奏的至境。

——胡琳:《音乐表演艺术中的身体美学》,原载于《艺术百家》2013年第5期

黄金周应成倒逼带薪休假的撬杠

当一些人抱怨黄金周高速公路上的拥堵和景区的爆棚带来的诸多不便时,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如果我们所有劳动者的带薪休假都真正成为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福利时,大家就用不着如此扎堆出行,我们的假期就不会这么忙乱和狼狈,幸福就会更多,遗憾就会更少。所以我们在讨论黄金周是不是该改变或者加多时,更应该把目光关注到带薪休假制度什么时候可以像黄金周长假这样被普遍实行。要看到,随着带薪休假者的增多,更多人可以直接把控休闲的时间了,就会有一些人自动避开黄金周出行,黄金周期间高速路上和景区里的车和人会渐渐少下来。这种来自休息时间的分流或会是最有成效的分流。这是值得期待的。

——黄渤海:《黄金周应成倒逼带薪休假的撬杠》,原载于2013年10月10日《大连日报》

(李珊珊 摘编)